

譯：社會及文化史中的檔案運用*

宋怡明**

基於數個理由，我認為自己並不是在臺灣的首要檔案館國史館60周年館慶大會發表主題演講的合適人選。首先，我並不是主要在檔案館進行研究的歷史學者，或者說至少不是狹義的檔案館。和那些歷史人類學或華南學派的師長和同事們一樣，我大部分時間並非在檔案館，而是在鄉野間，從普通人身上蒐集例如族譜、碑刻、地契、口傳神話、民間傳說等資料。因此，我的研究中主要使用的「檔案」並不存在於任何我能拜訪的圖書館或建築物中。我所運用的檔案可說是透過田野調查所創造。而運用這類檔案進行歷史研究，與正式檔案館如國史館中的檔案相較，涉及了許多不同的問題與挑戰。¹

其次，雖然我曾經寫了一本大量使用包括國史館等臺灣檔案館的專書*Cold War Island: Quemoy on the Front Line*（前線島嶼：冷戰下的金門），過去10年間，我一直在對岸從事明史研究，並未進行與臺灣相關的新研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檔案館與在臺灣所面臨的問題大相逕庭。在中華人民共和國，使用檔案所面臨的挑戰升高，檔案館越來越難以接近；在臺灣則一般而言情況正好相反。此外，像是國家檔案在尋求轉型正義時所扮演的角色這類重要問題，在今日對岸可說毫不相干。

儘管如此，我還是接受了老朋友吳密察館長的邀請。這篇短文描述我在兩種十分不同的檔案研究時的具體經歷，並從這些經驗出發，更廣泛地反思社會及文化史中的檔案運用。最末談談今日檔案在臺灣的重要性。

* 本文初稿為「國史館檔案與歷史研究學術研討會」之專題演講（國史館，2017年6月24日）。

** 哈佛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教授、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主任

¹ 對於這些問題，我在另一篇文章有更詳細的討論，參見：“Fieldwork for Ming Historians,” in Thomas DuBois and Jan Kiely, eds, *Out of the Archive: A Reader on Fieldwork Research on Modern Chinese History*（即將出版）。

明代檔案的案例

我舉的第一個例子，可被視為一個社會史家從檔案了解不同時代人類生活的傳統案例。大多數人們都認為國家檔案館是查找國家領導人或是政府政策相關紀錄的地方。在臺灣，我們自然地會聯想到收入蔣介石相關文件的大溪檔案。除了政治史及傳記，我們也可以利用檔案來探索社會史，撰寫平民百姓的歷史及日常生活。這是我尋求以明代檔案文件為基礎來撰寫的歷史類型。

這裡要探討的是一件衛選簿。衛選簿是現存明代檔案的主要部分。² 明代檔案只有極少量留存到現代，而當中大部分又已經出版（所以嚴格而言，我所要訴說的故事也不是關於真的檔案研究，因為這故事並非發生於檔案館，而是在已出版的檔案中）。

如同魯大維近期所論，明代研究長期忽略軍事史，雖然情況正在改善。軍事機關研究有助於將明史置於一個「更寬廣的、比較研究的、全球的視角」。只有研究軍事機關可以讓我們對明代朝廷權力的真實範圍，獲得完整的認識。³ 所以儘管衛選簿產生於明代軍事機關，其歷史重要性遠超過狹隘的軍事史領域。

衛選簿是一種典型的明代檔案資料，為協助國家運作，一種經由彙編及長期維持的行政文件。我們可以從《大明會典》以及更專門的軍事法規或前例，如《軍政條例》的諸多版本，來理解這類文件的形式特徵。這類文件具有直接的基本功能。明代的軍官是世襲制，衛選簿則用來記載這些世襲軍官家庭的詳細情況。每一筆紀錄記載了祖先如何入籍軍戶；他或他的子孫如何取得世襲軍官職位資格，又是哪一處衛所的職位；哪些家族成員擔任這些職位，以及繼任者的派選程序。衛選簿的每一筆紀錄可以被視為一種人事案卷，有數千個案卷存留下來。

在殘存的衛選簿當中有一份關於蒲氏家族的記載：蒲媽奴為晉江人，洪武16

² 相關討論參見梁志勝，《明代衛所武官世襲制度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頁13-30。除了檔案中保存的衛選簿，一些個人的服役紀錄則由世系家譜抄錄而保留。這些資料明顯需要額外的考證工作。

³ 參見David Robinson, "Why Military Institutions Matter for Ming History," *Journal of Chinese History*, 1:2 (July 2017), pp. 297-327.

（1383）年被徵召入伍，在家鄉附近的泉州衛任職，洪武21（1388）年沿海岸北調至福州，接著在15世紀初期，蒲媽奴跟隨鄭和下西洋，積功晉升為百戶。這項晉升是允許世襲的，也就是說在某些條件下，蒲氏家族之後每一位在軍隊中服役的子孫均可取得百戶的職位。

洪熙元（1425）年，蒲媽奴由軍中退役，但此時他的長子已經過世，因此他的職位由他的孫子繼承，衛選簿中持續記載了蒲氏家族接下來五代的服役情況，下一代是蒲媽奴的曾孫，他代替了他過世的兄長入伍服役，並在軍中一待就是近50年，接下來是他的兒子和孫子，一直記錄到萬曆33（1605）年蒲家的第七代繼承這個職位為止，在此之後的紀錄隨著明代最後數十年的衰敗而停止了。檔案中的紀錄像是一種家譜，但是記錄的並非家族關係，而是家族成員為明代朝廷服務的歷史。⁴

運用這份資料，我們可以撰寫什麼樣的歷史？閱讀這份文件的歷史學者有幾種方式答覆這個問題。最明顯的選擇就是由當中抽取出信息，就像我剛剛做的一樣，並且訴說這個不太重要的家族的故事。然而這個方法的重要性並不清楚，蒲氏家族的故事足以代表許多其他家族嗎？在明史更廣泛的課題中具有標誌性的意義嗎？第二個傳統方法則是利用這些資料在理論和實際層面研究明代的世襲軍官派任制度，例如研究者可以將大明會典中的行政規範和家族服役的實情進行比對。今日我們可以進一步發展這個方法，運用新科技將這些資料數位化，輸入資料庫中，這可以讓史家們概括整理所有目前殘存的衛選簿登記資料。

第四，史家可以將這種型態的故事和其他的文獻做比較，像是該地區的家譜或是口述歷史等等。而這也就是我企圖利用這份資料所做的事，以方法論來看，這像是針對歷史資料的三角測量法。

可惜的是我沒能找到蒲媽奴家的家譜，但是我收集到許多類似家庭的族譜。關於洪武21（1388）年蒲媽奴職位的調動有一項很有趣的發現，這是一次龐大的軍隊輪調政策中的一部分，使得接近祖籍所在地的沿海部隊被調離到較為偏遠的地區。《明實錄》也有記載：「甲午詔互徙浙江福建沿海土軍。初閩浙濱海之民

⁴ Michael Szonyi, *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7), p. 31.

資料來源：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提供。

在我最近出版的一本新書*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 Everyday Politics in Late Imperial China*（被管制的藝術：中國帝國晚期的日常政治研究）當中，我

⁵ 李景隆等，《明太祖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6年據北平圖書館藏紅格鈔本微捲影印），第233卷，洪武18（1394）年6月甲午條，頁3404-5。

試圖說明國家政策，本文此例指的是國家徵募軍官政策如何影響一般百姓的生活。由上述的檔案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到兩個多世紀以來，蒲氏家族成員願意以接受國家軍事徵召來交換包含軍官薪資在內的種種福利，家族必須在內部取得協調，以完成為國家提供軍官的責任，換句話說，家族必須組織起來。運用族譜，我們可以更加瞭解這些世襲軍官家庭是如何制定策略來應對這份義務。

我們知道明代軍隊中有數百萬的逃兵，這大幅削弱了明代的衛所軍制。結果明政府被迫任用了大量的雇傭兵，造成財政上的龐大壓力，並成為王朝衰弱的一個原因。檔案紀錄告訴我們有大量的逃兵，但卻沒有告訴我們這些人逃避兵役的動機。但以蒲媽奴的檔案紀錄為基礎，我們可以猜測這些逃兵是不願意接受蒲氏家族所接受的成本效益所約束的一群人。將一個文本與其他文本並置，我們可以利用這些微小的案例來探索龐大的歷史問題。換句話說，我們可以運用與其他歷史證據並置的三角測量法，來理解某個文本潛在的重要性。

金門的案例

上述關於蒲媽奴檔案的運用是社會史研究中十分直接和簡單的運用方法，我們可以用同樣的方法來運用國史館中所藏的當代檔案嗎？為了解答這個問題，接下來我們來看第二個案例。

大約在10年前，當我進行《前線島嶼》一書的相關研究時，我曾在國史館待上一段時間，當時我發現了許多和金門地區瘟疫防治相關的文件，許多文件中提到消滅島上老鼠的措施。從1950年代初期開始的數十年中，金門當局要求一般平民家庭必須達到一定的「殺鼠配額」，而這個配額最後訂在每人每月需殺鼠一隻。每個家庭需繳交死老鼠的尾巴來確保任務完成。1954年第2季時，金門居民總共上繳了超過24,000隻老鼠尾巴。⁶

運用這份資料的學者們在方法上面臨了和上述面對明代檔案的學者類似的選

⁶ 「43年防治金門鼠疫工作報告書」（1954年），〈金門鼠疫防治〉，《行政院衛生署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8000001979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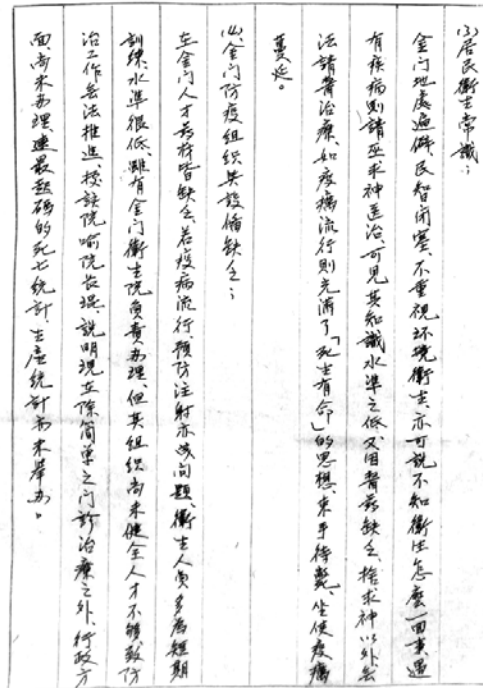


圖 2、福建省金門縣鼠疫防治計畫書（1951年3月）

資料來源：〈金門鼠疫防治〉，《行政院衛生署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8000001974A。

擇。首先學者可以提取數據，如此可以總結出一份金門島上殺鼠數量的表格，不過對多數人來說這是個十分枯燥和無聊的發現。即使學者彙整了歷年防治工作數據，製作出概覽變化趨勢的圖表，這樣也並非十分有趣。第三，學者可以從資料中找出這個政策的具體規定事項，並將其和瘟疫防治的科學知識來做比較。對於臺灣醫療史的貢獻來說，這可能比較有趣。

就像我運用明代檔案時會和其他不論是國家級檔案或地方檔案放在一起來比對一樣，國史館中的這些檔案最有效的運用方式並非單獨使用，而是將其和其他來源的資料作連結，包括已經出版的口述歷史或是我自己做的訪談紀錄。在此案例中，還有另外一份檔案可以添加至我所謂的三角測量法當中，那就是當我在進行這項研究時，我的朋友江柏煒在烈嶼鄉公所內發現的一些殘存鄉級檔案。

學者們經常會過度浪漫化他們運用檔案的經驗，當討論到這批鄉公所檔案時，我也很難避免這點。這些檔案被塞在幾十個麻布和塑膠袋中。在鄉公所一間布滿灰塵的房間裡，江柏煒和他的幾個學生與我必須經過詳細的分類和編目之後才能使用這些檔案。因為這不是個有其他讀者的安靜的圖書館，我們得以在有所斬獲時彼此大聲呼喊。除了手寫文書之外，我們還發現了其他文物，包括訓練民兵用的木造手榴彈、讓當地孩童可以識別在上空盤旋的解放軍空軍飛機照片等等。每一個學者都必須了解所運用檔案全宗的分類結構與機關沿革；在這個案例中，我們並不是透過閱讀一份已付印的目錄來了解，而是藉由將這些案卷從袋中取出、嘗試了解這些案卷與其他案卷關係的過程中來認識，這是個令人心滿意足的回憶。

相較於國史館檔案僅僅簡單地述說了這項活動，烈嶼鄉公所內的檔案對於這場滅鼠運動有著更詳細的描述，檔案提供了記載日期、上繳鼠尾的住戶名稱以及數量等細節的分類帳。為了落實這類較大型的政策，基層官員們必須建立起動員、監督、記錄和處罰的機制才行。烈嶼鄉公所的檔案包含了鄉村領導對於被要求執行一件對他們和鄉民來說毫無意義政策的抱怨，以及官員為推動該項運動召集的群眾會議紀錄。

從烈嶼鄉公所的檔案和當地口述歷史中我們得知，這場滅鼠運動的成效不如預期。就像在其他專制社會一樣，金門人民用盡各種日常中所能造成的阻力——那些James Scott稱之為「弱者的武器」的方法——來減少這種軍事化政策帶給他們的不便並最大化其自身的利益。為了能達成他們必須上繳的鼠尾配額，金門人民將一隻鼠尾切成兩半、從鄰人處借來鼠尾，或是用化學藥劑處理一種當地產的蘆葦，以製造出「假鼠尾」。人們對於達成配額的關心程度遠高於實際消滅當地老鼠的關心，他們實施一種「抓放鼠」的方法，抓到老鼠、切斷尾巴然後放生，或者是只殺掉公老鼠而將母鼠放生。

因此，透過高層級檔案、低層級檔案以及口述歷史及普遍記憶這樣的三角測量法，我得以證明國家級的政策能深入地方層級，並影響人民的日常生活，而人民也能找到自己的方式去處理國家對他們的要求，更有趣的是這些處理方式有時實際上破壞了這場滅鼠運動的目標。如果為了避免處罰只有上繳鼠尾一途，那麼

任何人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老鼠被消滅。所以金門人民找到達成官方要求的途徑，同時確保老鼠存活。這就是我在《前線島嶼》一書中關於金門滅鼠運動的主要論述。

但今日重新審視這些材料，我感覺到當中似乎有某些錯過了的機會。在最近閱讀過一些檔案相關的著作像是Nicholas Dirks的*Autobiography of an Archive*，以及Anne Laura Stoler的*Along the Archival Grain*後，我更進一步的思考了檔案本身如何作為研究的對象。關於金門滅鼠運動的文件不僅僅能用來講述平民百姓日常生活故事的背景，同時也可以用來講述一個治理理論和實踐不停在變化的故事。這不僅涉及到從檔案中提取出怎樣的內容，還包含了去思考檔案中有什麼？沒有什麼？文件中提及了哪些事？又對哪些事保持沉默？

1950年代初期，對於中華民國的防衛而言，金門的軍事意義非常重要。瘟疫或其他疾病對於金門島上的軍事力量是一種威脅，因此運用各種科技措施試圖控管瘟疫看來十分合理。早期的文件將這些瘟疫視為需要用科技力量來解決的問題：要接種疫苗、進行檢疫並消滅病菌載體。也有其他文件側重在金門地區民間的落後及糟糕的衛生條件，就像某一個檢查隊所報告的：「金門地處偏僻、民智閉塞，不重視環境衛生，亦可說不知衛生怎麼一回事，遇有疾病，則請巫求神醫治，可見其知識水準之低。」⁷

隨著時間的推移，瘟疫問題被轉化為民間動員問題，控制老鼠問題變成一場運動的主題。這場運動的意義不僅在於滅絕老鼠是重要的，也在於這是一項教化金門當地人民文明工程的一部分。這場滅鼠運動的示範效應也一樣重要，作為一場宣傳秀，滅鼠運動展示出金門人民面對軍事威脅的決心。（在《前線島嶼》一書中我曾經探討過這場宣傳是如何一網打盡中國大陸人民、臺灣人民，以及中華民國的冷戰盟邦，特別是美國。）換句話說，這是一個國家如何更進一步地滲透進其人民生活的故事，但這和改善人民的生活無關，更多相關的是對於現代化的夢想以及國際地緣政治的壓力，也是關於如何構思、建立並最終實行軍事化了的現代性的故事。

⁷ 「福建省金門縣鼠疫防治計畫書」（1951年3月），〈金門鼠疫防治〉，《行政院衛生署檔案》，國史館藏，入藏登錄號：028000001974A。

我在《前線島嶼》一書中也提到，雖然在意識形態上和中華民國完全相反，在中國大陸地區的政權也發起了類似的滅鼠運動，即所謂滅四害，這種研究方法讓我們更加容易了解海峽兩岸的兩個平行政治實體，雖然在意識形態上有所差異，但是兩岸政權皆致力於人民動員和現代化，事實上這種運動在邏輯上是十分相似的。

結語

在我所舉的第一個例子中，我研究檔案並試圖找出當時真正發生的事情，老實說結果並不十分有趣。一名男子被徵召入伍，然後晉升為軍官，他的子子孫孫繼承了他的職位。只有將檔案中所含的訊息和其他來源的歷史材料做三角測量法之後，這個故事才有可能變得有意義和重要起來。這個故事提供了一個關於國家政策如何塑造出人民日常生活經驗的研究入口。而在我提到的第二個例子中，我運用相同的方法，將檔案中所提供的資訊和其他來源的材料進行三角測量，並產生出相似的結果。第二個例子中所能證實的東西較為豐富，它提供了我們探討某些議題，像是「弱者的武器」以及環繞記憶的歷史議題等等的空間。不過當我停止將檔案視為一種解答，而開始將檔案視為問題，檔案中所蘊藏真正豐富的內涵才會開始顯現出來。

與其問在戰地金門發生了些什麼，我們可以改問：為何檔案中會以某種語言記錄下某些事件。什麼事情不被記載，而原因為何？檔案紀錄對什麼保持沉默？Anne Laura Stoler曾寫道有3個範疇的資訊不會被記載在檔案中：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所以不用記錄的常識、還不能夠闡明的事，以及絕不能說的事。⁸ 換個方法來問就是：哪些事情是金門戰地的常識？這些戰地常識是如何隨時間轉變的？金門的行政官員和人民是如何在政府訓令的實踐和日常生活中取得平衡？

透過探索這些問題，我們開始看到這個轉變中國家的文化史。科技的解決方

⁸ Ann Laura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Epistemic Anxieties and Colonial Common Sens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3.

案被實行現代化的方案代替了，然後問題又轉向了宣傳和動員方面，象徵性方案的重要性凌駕了地方上的解決方案。國家安全考量越來越深入治理工作，因此繳交老鼠尾巴這樣的事也變得軍事化，抓不到老鼠則變成親共的象徵。如果我們將目光由檔案的內容轉向形式，又如果我們可以讓檔案成為民族誌分析的主題，那麼一種全新的史學型態就會成為可能。

我所說的讓檔案成為民族誌分析的主題指的是什麼呢？在此我想將檔案的可達性（accessibility）、透明度以及民族誌做個區隔。檔案的可達性一方面指的是我們可以多輕鬆的運用這些檔案——檔案目錄是否容易利用？檔案開放的時間為何？檔案館是否對各年齡層及身體不方便的人士開放？館內是否有方便的閱覽及複印設施？館員是否能幫助解決讀者的問題？這些都是很實際的問題，同時背後也有其政治考慮。檔案的可達性在另一方面直接指涉政治問題：誰可以使用檔案？是否所有文件可以被所有人閱覽，又是哪些規定限制了檔案的使用？

與引致實際與政治問題的可達性不同，檔案的透明度是一個學術性與知識性的問題：產生這些政策紀錄的指導原則為何？這種指導原則怎麼產生出文件本身？並怎麼使文件被歸檔？而為何檔案會以某種形式被編排？隨著時間的推移又會有怎樣的變化？解答這些問題是學者們在接觸檔案時所必須回答的核心課題。過去70多年來，許多同事和我帶領哈佛大學中國史博士生，在一門簡稱為Qing Docs（清史檔案）的資料閱讀課上，探索這類課題。這門課最初由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創立，後由孔飛力（Philip Kuhn）、歐立德（Mark Elliott）接續，現在由我主講。⁹ 在這門課上，我們教導學生各種類型的清朝檔案文件，這些文件的彼此關聯，以及如何有效解讀。所以這門課其實正與讓檔案透明有關。

然而逐漸地，我們嘗試訓練學生對檔案的民族誌分析。Stoler清楚介紹了「檔案模式的民族誌」的知識來源。Carlo Ginzburg與Natalie Zemon Davis是兩位最負名聲的實踐這個研究方法的學者。他們的名著尋求發掘特殊文體如何被用以支持或推翻某些主張，以及解釋這些文體選擇的深層文化史。¹⁰ 另一個相關

⁹ 這門課的歷史沿革可參見：田霏宇，〈一門歷史課的歷史〉，《讀書》，2005年第9期（2005年9月），頁111-115。

¹⁰ Carlo Ginzburg, John and Anne Tedeschi trans., *The Cheese and the Worms: the Cosmos of a Sixteenth-Century Mill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0); Natalie Zemon Davis,

的知識史研究方法則是「逆著紋理閱讀」，認識檔案文件是帶有偏見的資料，並試圖揭露偏見的運作。然而「檔案模式的民族誌」與「逆著紋理閱讀」二者都仍將檔案館中的學術視為提取內容的習作，而非形式的分析。一種檔案的民族誌（*ethnography of the archive*），而非檔案裡的民族誌（*ethnography in the archive*），探索權力與知識的關係是如何形塑檔案的生產、組織、再編排，以及保管，¹¹ 將重點放在檔案的收集、保存與展示政治。這就意指超越僅僅讓檔案透明的目標，而前往一個新的方向。例如檔案的構建與其告訴我們世界恰如其實，不如在訴說一個如何由產生檔案的不同個人或組織所想像或感到畏懼的未來世界。這個方法意味著讓檔案透明的目標其實可能誤導、適得其反，或根本不可能達成。

檔案研究的民族誌轉向是個相對晚近的發展，檔案的透明度及可達性問題則經年且普遍發生。學者、官員及政治人物對於檔案下了不同的賭注。對於學者來說，檔案可達性的問題十分簡單，所有的學者都希望擴大檔案的可達性。但是單單主張使檔案完全不受政治考量和安全考量所限制，無疑是太過逃避現實和天真的想法。這在每個國家都是如此。在我看來，臺灣在可達性方面無疑是極具有特色的。我還清楚地記得我在上次使用國史館檔案前，我才剛在老家加拿大的國家檔案館做研究，在那裡我想要使用一些1930年代的移民紀錄，由於某些原因，這批紀錄在很久之前被認定為機密。我在加拿大國家檔案館度過了漫長且令人沮喪的一天，填寫關於「信息自由化」的表單。我所遇到真正的問題在於官僚主義，而非安全性，事實上這批案卷從未涉及國家機密，且相關人員早已過世多年。館員們沒有動力要讓我對檔案館留下好印象。接著我飛到臺灣，坐計程車到新店，幾分鐘內我就看到了1940年代起始的一些史料。這前後的對比實在太驚人了。

2016年，臺灣在全球開放資料指數上名列121個國家之冠，和澳洲並列為全世界開放資料最多的國家。國史館為落實「開放政府（open gov.）」政策，將大量完成數位化的數位檔上網，亦即上千萬頁的珍貴史料。這種開放是對臺灣人民創建出的健全民主社會的極佳宣傳。在我看來，臺灣在社會、文化以及政治上的

Fiction in the Archives: Pardon Tales and Their Tellers in Sixteenth-Century France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¹¹ Stoler, *Along the Archival Grain*, pp. 44-45.

開放性是值得慶賀的，即使是布滿灰塵的檔案。這也使得臺灣檔案可達性的爭論特別重要。也許有某些政治或安全性上的考量限制人們訪問您們的檔案館，但同樣也有非常強烈的政治理由促使您們持續努力成為世界上最容易接觸訪問的檔案館。（邱鐘義、廖文碩翻譯，宋怡明審訂）